

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

——探讨世纪之交的人生巨变——

北京大学 乐黛云

人类面临的时空巨变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从机械生产转向初期信息时代，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超级女声海选，群发集会，博客，一般大众可以向任何人发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意愿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成长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长大，自我成长。我们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来深感迷茫。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体外受精等等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优选。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

还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子，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所谓纳米技术就是在十亿分之一米尺度的空间内，研究和利用电子、原子和分子运动的规律和特性，实现对整个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纳米电子器件的工作速度是硅器件的1000倍，功耗低，信息存储量大，纳米电子在一张不足巴掌大的5英寸光盘上，至少可以存储30个北京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这些新发现和革命性的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迫使我们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正在成长，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自我观念都将与我们迥然不同。任何想用过去的陈规来阻遏他们前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倒退的！有人想用封建时代的行为规范来塑造新一代青少年就更是痴心妄想！

以上这一切大变动，加上20世纪的苦难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绝灭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J.里夫金在《欧洲梦》一书中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变动，认为这种变动划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什么是美国梦？

“美国梦”和“欧洲梦”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所谓“美国梦”主要是指每一个人 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依靠别人或受惠于他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愈多，个人就愈加自由独立。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一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人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正义份额的地球财富。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 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 5%。有统计数字说，如果中国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有七个地球来供应！在美国社会一切主要都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 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作为国家，美国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 并保卫自己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得的东西。

总之，美国梦就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美国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共同的梦，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梦，以至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的梦或者什么别的其他的梦。许多影片中都有这样的镜头：那些从欧洲或其它地方跑出来准备到美国开辟新生活的各色人等，在船上终于看到自由女神或者世贸双塔，于是欢呼雀跃，精神百倍。美国梦 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从哲学角度看，美国梦的精神原则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竞争主义和征服主义，集中起来就是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发财。

但是，很显然，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梦就不可能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所想象的成功，“人人成功”是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中最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逻辑上说，美国梦永远只能是“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这样的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梦，对于某些人就是恶梦。于是，美国梦的深层意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的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美国梦无条件地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功，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敌对方，甚至所有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都被先验地定义为美国的敌人。铁的事实是，只有当人们都出让某些自由而且出让足够多的自由，才可能形成合作协调的友好关系，才能在事实上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假如夸张自由的绝对性，就不可能发展友善意识（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所以夸张自由的梦想必定具有与他者为敌的基本意识。美国声称对于本土人民是个自由“乐园”，对于世界上不自由的人民是个让人得救的“方舟”；对于自由世界是个最好的榜样，对于其它异样的世界则是个战士和拯救者。当美国为自身构造了这样的政治神学，美国就终于把自己塑造成试图 统治世界的新帝国。它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方”绝对区分开来，把美国的存在使命化。事实上，它在为自己编造拯救世界的政治神学使命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

了世界的敌人。从本质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为世界准备的梦，而是一个为美国自己，也就是为美国的少数人谋幸福的梦，一个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去的梦，一个分裂世界的梦。

什么是“欧洲梦”？

在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这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自我修养；不是钱财的聚敛，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总之，有“生活质量”的生活，大概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

与美国梦不同，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欧洲梦强调的是“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的享受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几乎是“第二次启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

J.里夫金认为“美国梦”和“欧洲梦”作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经济基础也有所不同。前者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利益来实现的；后者则以网络经济为主体，在网络经济的范围内，要求每一个人为另一方作出贡献，强调“互利、双赢”，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推而论之，市场基于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一定程度的信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而非通过所有物（belongings）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在一定范围内是合作性的。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有相应的变化。照 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斗争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合作是多元性的，更多围绕着保存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

“美国梦”和“欧洲梦”也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历史原因。“美国梦”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即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核心，这一理论在美国深得人心；而“欧洲梦”则以康德的人权思想作为哲学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今天又进一步成为欧洲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欧洲和美国都把个人的绝对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欧洲更重视的是精神个人主义，而美国推崇的是物质个人主义。这一差异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现代性”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却决定了非常不同的日常生活风格和情趣，并及于关于环境的看法。在历史原因方面，二次大战可以说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分水岭，欧洲和美国由此获得完全不同的体会。欧洲体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走向和平主义、理性对话与合作策略；而美国则体会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从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策略。可以说，欧洲从二战得到各种负面的经验，从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后现代思潮。美国则从二战得到各种正面的经验，于是决心把现代性推向顶峰。尽管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潮，但与美国取得的惊人的物质和政治成功相比，却显然缺乏社会影响力。

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J.里夫金相信“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昂贵生活不等于有质量的生活）。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意识到了，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得太多。美国的单边主义将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又缺乏效率的策略，甚至也不是对美国自己的有利的策略，因为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轭”现象，单边的利益最大化变得不切实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而且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梦未必是好梦，从这一点看，美国梦确实是“过时了”。

在我们看来，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欧洲梦的保护主义策略是在抵抗也许堕落了的世界，而不是

与世界合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欧洲品质而试图抵挡同样发达的美国的“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而试图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坏的”竞争方式，因而不可能公平地对待移民问题。

事实上，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一百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每年迎来五十万年轻移民，（这个数字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年的德国，只有1.3%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年，却有18.4%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在德国，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法国的动乱，德国的市场爆炸都是实例）。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亡；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们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忱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有关中国梦的遐思

J.里夫金很重视在未来世界建构中中国的地位。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

他认同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所说的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比西方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他引用汉学家，也是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的话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J.里夫金也同意尼斯贝特所说的，对关系的持续关注使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如果说美国家长用一种“尔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教育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传统的亚洲家长则更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他们帮助孩子与他人互动，协调自己的行为。同样，J.里夫金认为由于整体化的倾向，亚洲人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说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总之，J.里夫金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更加关注的是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而非只注意孤立的现象，因而与欧洲梦更为接近。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变；当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悬殊，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是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J.里夫金认为，从这个20余年来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综合在一起。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断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无疑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梦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中国梦是老子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传贤不传世），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财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和也，平也）”（礼记·礼运）。这是一个和平（世界）、和睦（邻里关系）、和谐（身心内外）的梦，“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然而，这个和谐之梦并未能造福于现代中国，以致中国日益贫弱。它必然被另一个百余年来“强国梦”，即现代化之梦所代替。中国在构思“中国式的现代化梦想”时，往往希望能够综合世界各种现代化模式的优点，而且还特别希望能够综合中西文化的优点，避开纯粹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如果说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化的条件是殖民地掠夺和绵延不绝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这两者之外去寻求。

社科院的赵汀阳教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他认为为了追求这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毛泽东以非凡的想象力构思了一个“最新最美”的纯洁梦想，毛泽东理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与所有以往社会模式决裂的社会，一个既不中，也不西的绝对新社会。因此，他认为“一张白纸”反而最适合成为绝对的新起点，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很可能相信一种全新的社会操作能够形成全新的经验，从而发展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新社会”是扫除了一切社会都难以避免的所有丑恶现象的纯洁社会，毛泽东真的惊人地做到了这一点。50年代初期，确实做到了消灭黄赌毒以及其它肮脏的犯罪，以至达到了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当时还努力追求“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状态。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状态。“新社会”在抛弃旧模式、欢迎新经验、探索新制度等方面，都是对“新”和“不断的新”有着无比的热情。这一点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性。毛泽东的纯洁梦想至今也还鼓舞着许多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系列极左的错误，没有无法挽救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纯洁梦想还会在中国怎样发展，但是，当时，邓小平不得不把中国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义无反顾地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上来。“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转变首先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国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贫穷问题有了初步缓解。今天，问题又变成贫富差距，三农问题。于是，现代化发展的梦想就进一步表现为“和谐社会”。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梦想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同时与中国几千年来“和谐梦想”联系在一起。（同时扬弃其无用部分，“小国寡民，结绳而用”当然做不到，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看重生活的审美层面的生活态度仍然对我们有益。）

多年来，有识之士认为“新中国”必须创造一种独特的亘古未有的精神，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这新中国精神是什么样的呢？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社科院哲学所的赵汀阳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赵汀阳教授分析说，我们现在能够用来思考各种事情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所定义的，尤其是那些决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义的意义和所指，而这些西方所定义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难点，尤其不完全适合中国经验。新中国精神应该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因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为世界负起责任的大国。假如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就不能以新的中国精神参与不断发展的世界文化的重新建构，这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更不能封闭于古代社会产生的传统文化之内，而必须对它重新诠释，寻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

根据他的思考，中国梦需要认真考虑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样的思想/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地思考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显然，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就不可能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大观念，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和社会。这一点是中国很久以来比较忽视的；（2）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要求有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设计。这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目前所知道的社会都达不到公正社会的标准，都或者是对经济人和小人有利或者是对庸人和弱者有利，还从来没有一种对有德之人最有利的社会设计；（3）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永远觉得生活有意义？这要求一个社会必须有利于发展高水平的精神生活，显然，物质生活的魅力是单调、简单和贫乏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靠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去长期维持人们的生活意义和兴趣，人终究要过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无限丰富发展的空间。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目前世界上

的各种梦想都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赵汀阳教授在他的专著《天下体系》一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发挥。

结束语

总之，《欧洲梦》一书提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深刻问题，正因为是前瞻，而尚未经过事实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不是定论，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所能提出方案加以解决的。但这本书高瞻远瞩，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思考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反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常态，J.里夫金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视野的重要部位。他认为在许多方面，欧洲和中国都正在并肩作战。例如欧洲正努力在强调安全稳定的社会架构和重视独立企业精神的市场体制两者间寻找平衡；而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达到平衡也恰恰是中国正在追求的目标，相似的努力也正在成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热切讨论的话题。他认为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就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J.里夫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中国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J.里夫金认为，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现在，随着美国梦在21世纪渐渐褪去其昔日的炫目光彩，世界将它的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人们在问：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可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什么？在J.里夫金看来，尽管断言欧洲梦和觉醒中的中国梦的融合结果会是什么，还为时尚早，但预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则绝非言过其实！

J.里夫金在《欧洲梦》出版时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息息相关的时刻！正在展开的欧洲梦试图开启一扇大门，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作为生存于此世的人类，什么才是我们存在于21世纪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世界正在急遽变化，根据科学家的预测，这种变化是“指数型”的，也就是说变化的速度会由很慢变得越来越快。从秦汉到民初，社会的变化并不大，而进入20世纪以后，其变化越来越目不暇接、光怪陆离。所有指数型的物理过程都引向系统的崩溃而告结束。如果说这一推断基本无误，那么人类应如何来面向这一日益加速的社会进程，又如何来应对世纪之交的人生巨变？

改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06年10月14日